

『人』与『文』的交响

——梁实秋文学理想论纲

魏斌宏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人』与『文』的交响

——梁实秋文学理想论纲

魏斌宏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李之美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与“文”的交响:梁实秋文学理想论纲/魏斌宏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9.10

ISBN 978-7-01-020785-8

I. ①人… II. ①魏… III. ①梁实秋(1902-1987)-人物研究②梁实秋
(1902-1987)-文学研究 IV. ①K825.6②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86376 号

“人”与“文”的交响

REN YU WEN DE JIAOXIANG

——梁实秋文学理想论纲

魏斌宏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中煤(北京)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9 年 10 月第 1 版 2019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9

字数:250 千字

ISBN 978-7-01-020785-8 定价:5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内 容 简 介

Brief Introduction //

文学理想是打开梁实秋文学世界的一把钥匙。本书将梁实秋置于 20 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语境之中，在对其人其文进行精细解读与全面观照的基础上，围绕其对文学理想的坚守及主体人格的理想主义情怀，以人观文，以文察人，“人”“文”互证，从核心价值和精神主脉两个面向，深入考察了梁实秋文学理想的形成过程、演进脉络及体系框架，并对其超越性、前瞻性、建设性及局限性予以整体把握。在致力于破译梁实秋文化精神密码的同时，本书还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度反思。

本书受到天水师范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省级重点学科及甘肃省高等学校协同创新团队项目“甘肃远古文化及华夏文明协同创新团队”(2018C-24)建设经费资助

目 录

绪 论 重叩文学理想之门	1
第一节 文学理想的界定与流变	13
第二节 梁实秋文学理想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31
第三节 梁实秋文学理想研究的问题意识、意义、方法及内容	48
第一章 梁实秋文学理想的生成及变迁	54
第一节 生成语境	55
第二节 哲学基础	67
第三节 历史嬗变	90
第二章 梁实秋文学理想的品格呈现	107
第一节 “人性”文学的深情凝眸	107
第二节 超越政治现实的艺术诉求	125
第三节 追寻古典精神的价值守望	139
第三章 梁实秋文学理想的实践方式	154
第一节 文学批评	154
第二节 散文创作	169
第三节 作品翻译	182
第四章 梁实秋文学理想的流脉余韵	196
第一节 中国大陆文坛：学理暗合的“人”学脉流	198

第二节 台湾地区文坛：从侯健到余光中的理想承续·····	217
第五章 梁实秋文学理想的现代意义 ·····	239
第一节 实然与应然：慎言理想的理想主义·····	239
第二节 人格与文格：人格理想与文学理想的相互映照·····	250
第三节 “赋魅”与“祛魅”：文学理想的当下评衡·····	264
结 语 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心灵孤旅 ·····	280
参考文献 ·····	285

绪论 重叩文学理想之门

肇端于 1840 年的鸦片战争，开启了中国历史的近代化进程。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长期关锁的门户，彻底惊醒了清朝统治者“天朝上国”的迷梦，中国社会也由此被动地纳入了“世界一体化”的范畴之中。面对着列强来势凶猛的侵略与渗透，延续了两千余年的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①也因着内忧外患的日益加深而变得脆弱终至分崩离析。在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②的大背景下，一系列试图挽狂澜于既倒的方案如过江之鲫，相继上演。从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到洋务派的“师夷长技以自强”乃至戊戌变法的改良主张、清廷立宪运动的昙花一现等等，都是在救亡图存的主基调下借“夷”之“鸡”生己之“蛋”的种种努力和尝试。正是在这些不断的尝试中，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才逐渐感到了自身的不足，这种不足感先后经历了一个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的嬗递过程^③。在认识的不断深化中，

① 金观涛、刘青峰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宗法一体化结构及其维系的内部子系统，包括发达的地主经济、大一统的官僚政治和儒家正统学说意识形态，在两千余年中保持了巨大的稳定性，进而形成了一个“超稳定结构”。（参见金观涛、刘青峰：《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93 页）

② 李鸿章：《筹议海防折》，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 6 卷，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59 页。

③ 参见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易鑫鼎编：《梁启超选集》上卷，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475—477 页。

浸淫中国已久的传统“古今之辩”悄然让位于“中西之争”与“新旧之别”，尽管思想界作为评判价值或真理的主要标准的“谱系外衣”并没有完全被撕破，但是，在根本观念上，深刻的变化已然发生。诚如美国汉学家列文森所言：“到了19世纪，尽管古典仍是价值的标准，然而西方的入侵促使中国人对过去各家学派之争论的评判发生了变化。与使人眼花缭乱的西方文化比较，中国各思想派别之间的小分歧和小冲突已变得无足轻重。当一个新的也更加名副其实的西方异端出现在中国所有思想派别的面前时，中国各思想派别之间的差别则相应地模糊不清了。西方的冲击使中国各派思想实现了联合，当西方成为一个必须认真对付的对手时，中国各派思想则紧密地团结了起来。‘新’还是‘旧’的问题仍然是价值的评判标准，但评判的对象已从中国扩展到了西方。当他们感觉到西方的严重威胁时，中国各思想派别的第一反应就是放弃了他们之间的谁旧谁新的争论。因为他们都是旧的（在西方文化来到之前，他们就已经存在），只有西方文化才是新的。”^①自然地，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等的一切都成了中国社会各领域的镜像或参照。

风起于青萍之末。历史的经验表明，“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②文学艺术向来扮演着时代晴雨表的角色，是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的显性呈现。尽管他们之间并不总是呈现亦步亦趋的紧密关系，但是面对着时代的变迁，它往往会以迅捷的反应走在时代的前沿，成为最早或者较早觉醒的文化样态。与此紧密相关的则是，作为“社会良心”的知识阶层自然也被责无旁贷地推到了时代的最前列。虽然历史发展的惯性作用依旧在发挥着威力，浅吟低唱、闭目塞听，悠然在中国古代文学的余荫之下陶醉徜徉的文人并不在少

^① [美] 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郑大华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0页。

^② 鲁迅：《论睁了眼看》，《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4页。

数，但和着时代的节拍，致力于文化和文学上的革新和改良的风潮却也如火如荼，从龚自珍、张维屏、黄遵宪的诗歌，再到王韬、薛福成的散文都表现出异于过去士大夫诗文的鲜明特色。尤为典型的是梁启超所领导的“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一方面强调将“新意境”、“新语句”融入“古人之风格”，铸就自具面目的“二十世纪支那之诗王”^①；另一方面则更加凸显文学的社会功用：“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②，表现出一种急切地求“新”求“变”心态，将救亡的现实需求与启蒙的理想愿景错综地交织在一起，复杂难辨。

而就此一时期的新潮文学观察，亦可以明显发现，倡导者在赓续文学本体觉醒、追求文学独立价值的某些因子的同时，更欲借文学之力实现政治与社会变革的迫切心情和愿望，而且此种意图的分量明显要重得多。平心而论，这种努力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在当时的现实情境下，救亡图强的现实需要成了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能为此作出贡献的手段和方法不妨都拿来一试，文化与文学当然无法缺席。但是，问题的吊诡之处也恰恰就在这里，当同一事物内部的数种力量奔突向前而缺乏必要的制衡时，必然会使得某种力量演变为“一家独大”，最终反倒会成为压制乃至扼杀其他力量的“罪魁”，进而阻碍事物发展的多元性。晚清以降的中国文学的近代化历程，正鲜明地体现出了这种特色。

在这种情况下，大多较早觉醒的知识分子的兴奋点明显地具有向政治迁转的趋向，关注文学的政治功用，强调文学为现实服务成为一时风潮。而对于文学本体问题的探讨则被挤压到了一个逼仄的角落，理想的火光终被淹没到了现实斗争的滚滚红尘之中。亦有清醒者如王国

① 梁启超：《夏威夷游记》，易鑫鼎编：《梁启超选集》上卷，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年版，第324页。

② 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易鑫鼎编：《梁启超选集》上卷，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年版，第320页。

维早在1904年就对此种偏向提出过警告和担忧：“于学术非有固有之兴味，不过以之为政治上之手段，《荀子》所谓‘今之学者以为禽犊者也’。……又观近数年之文学，亦不重文学自己之价值，而唯视为政治教育之手段，与哲学无异。如此者，其褻渎哲学与文学之神圣之罪，固不可逭，欲求其学说之有价值，安可得也！故欲学术之发达，必视学术为目的，而不视为手段而后可。”^①但毕竟声音微弱。

从甲午海战的战败到1915年《新青年》^②创刊这二十年间，中华民族更是到了“生死存亡之秋”，清廷的覆灭与民国的建立，并没有改变危机四伏的现实，思想文化的僵化保守迫切需要崭新观念的滤淘。长期的暗流涌动必然要喷决而出，中国思想文化的现代构型终于出现了一个节点，在《青年杂志》的发刊词《敬告青年》中，陈独秀率先揭橥“民主”和“科学”的大旗，掀起了一场暴风骤雨式的新文化运动。1917年，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两篇鸿文相继在《新青年》上发表，则直接开启了现代文学的大幕。自此，现代文学的开拓者们无论是在文学形式还是文学内容上，都表现出一种弃旧从新的决绝态度，正如汪叔潜所言：“新旧二者，绝对不能相容，折衷之说，非但不知新，并且不知旧，非直为新界之罪人，抑亦为旧界之蠹贼。”^③这种态度显现的激进特征以至于有学者将其总结为“全盘性的反传统主义”。^④

① 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周锡山编：《王国维集》第2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02页。

② 《新青年》杂志1915年9月15日创刊于上海，初名《青年杂志》，主编为陈独秀。从1916年9月1日第2卷起将社址迁至北京，改名为《新青年》，是当时最有影响的文化杂志，也是新文化运动的“桥头堡”，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周作人的《人的文学》等在当时产生重要影响的文章均发自该刊。

③ 汪叔潜：《新旧问题》，《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1915年9月15日。

④ [美]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穆善培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页。

以此为背景，思想文化上最为重要的路向便是“人的觉醒”与“文的觉醒”。对于人的价值与尊严的探讨和文学独立价值的追求成为最为热门和迫切的时代课题。整个中国社会就像一个岩浆沸腾的熔炉，喷薄出巨大的能量，精神为之一振。特别是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的结合所形成的所谓的“五四精神”，更使得这种启蒙话语获得了空前的成长空间。“为人生”的文学与“为艺术”的文学思潮交相辉映，共同铸就了中国现代文学启幕阶段的辉煌，也在某种程度上对前现代文学思潮的“泛政治化”进行了一定的矫正和反拨。

但是，毋庸讳言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尽管开启了中国精神文化的现代进程，文学革命首发其端，但在其后的走向上却很快呈现出多元的色彩，表现了先驱者不仅仅以文学革新为满足的求变心态。由此，“文学革命很快地从一个目的变成了手段，又从手段导出许许多多的目的。”^① 因而它并非一个纯而又纯的文化运动，其内涵要远为复杂得多。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伦理的、哲学的等方面的诸多诉求都可以涵括其中。诸多的诉求需要有相应的理论支撑，因此，对于西方思潮的近乎疯狂的引进和吸收，自然也就成了水到渠成的必然选择。由此也真正造就了一种多元共生、众声喧哗的时代景观。在这种胜景之下，参与其中的知识阶层在吸收与解构中寻找自己的话语利器，确立自己的位置，在相互的辩难中进行着各种设计，似乎人人都有一套方案，他们以高度的自信乃至武断的态度表现出一种舍我其谁的宏大气魄：“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② 闪耀着浪漫而理想的辉光。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尽管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众列强无暇东顾，对中国的侵略暂时有所松懈，也为社

① 李敖：《播种者胡适》，《李敖大全集》第5卷，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0年版，第12页。

② 陈独秀：《答胡适》，水如编：《陈独秀书信集》，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133页。

会、经济、文化等的发展赢得了—个短暂的机会，而国内军阀走马灯式的统治也无力过分的禁锢新思想的抬头，这都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启蒙思潮汹涌的基本背景。但这只是一枚硬币的一面，其另一面则是救亡。其实，自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八十年，中华民族几乎没有喘息的机会，内忧外患就像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样始终悬在人们的心头，梦魇般挥之不去。因此，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而言，救亡也是时代所赋予其必须承载的不言自明的历史使命。

可是，这枚硬币两面彰显的直立姿态却并没有维持多久，随即就在时代驱动其高速旋转的相互角力中，使得其正面最终落到了救亡—面，而将启蒙的另一面深深地压抑到了底下，即李泽厚所谓的“救亡压倒启蒙”^①。这种状况在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迁转过程中表现得尤为显豁，而在此后的发展中，政治性的话语再次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对文学的影响亦至为深远。中国现代文学正是在这样一种“化零为整”的方式下渐渐走向“单极化”，在反对传统的同时实现了对传统“文以载道”的另—种回归。许多问题提出来却又在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乱象中被简单化约，简单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成为许多知识分子解决问题用得最为顺手的思想工具。诚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五四’的—个缺点，正在于对待事物的‘泛化’的或‘化约’的方式，它提出了许多重要问题，却又抽象地混淆了它们。”^②事实上，这—缺点—直贯穿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主体建构当中，政治性—元话语的最终出现则是此种缺点畸形的极致呈现。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

① 李泽厚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与“救亡”的两个主题最初是并行不悖、相得益彰的，但是随着国内外危机的日益加深，“救亡的局势、国家的利益、人民的饥饿痛苦，压倒了一切，压倒了知识者或知识群对自由、平等、民主、民权和各种美妙理想的追求和需要，压倒了对个体尊严、个人权利的注视和尊重。”（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下，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849—850页）

② 韩毓海：《关于“现代性”与“现代化”》，《学术月刊》1994年第6期。

思想解放大潮的再次汹涌，才逐步引起了学界的关注与反思。

毫无疑问，文学向政治性话语的归趋，一方面，对于灾难深重的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而言，是有益的，它有利于个体超越自身的狭隘局限，充分认识自身的历史使命，进而实现现代民族精神的重铸；另一方面，此种倾向的弊端则是以牺牲个体、个性乃至文学的本性为代价的，这种代价亦是惨重的，非一个短暂的时期所能弥补。在审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过程中，可以明显地发现，许多早年间葆有文学理想的作家，很快就在现实政治的感召下纷纷转向，将文学理想自觉不自觉地让渡给了社会理想或政治理想，将其变为现实斗争的利器，理想的光芒日渐暗淡失色。更为等而下之者则是理想的彻底落幕，主体意识彻底沦为随现实政治甚至领袖意志左右晃动的钟摆。

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中国现代文学明晰的主潮并不能掩盖其多元的面相。主要建筑于西方文艺思潮之上的中国现代文学，在“短短十年中间，西欧两世纪所经过了的文学上的种种动向，都在中国很匆促地而又很杂乱地出现过来”^①。这就决定了其内部必然呈现出交错纵横的复杂性，也使得我们对当时的文学观念的判断所惯常使用的一些范畴诸如中与西、新与旧、激进与保守、传统与现代、功利与审美等等并非像围棋的棋子那样，黑白判然而分。而恰恰正是这种错综的纠结所形成的一种张力结构，才共同构筑了中国现代文学色彩斑斓的一张网。

因此，不管是对现代文学思潮而言，还是对于某些我们惯常划归于某种思潮下面的代表作家来说，简单的、笼统的乃至以胜利者的高姿态所作的判定经常都是值得怀疑的，其最大的弊端是往往容易陷入“见木不见林”的困境，即抽取某一些孤立的事实印证先行的理念而忽视对其整体性的考察。尽管不可否认的是，对于历史的叙述永远是一种选择

^① 郑伯奇：《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导言》，刘运峰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言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6页。

和建构，“只有当历史学家要事实说话的时候，事实才会说话；由哪些事实说话，按照什么秩序说话或者在什么样的背景下说话，这一切都是由历史学家决定的。”^①但是，如果我们能从竭力还原历史现场和切近主体意识与心态入手，拉开时间的距离，通过搜罗正反两方面的资料，在“同情的理解”的基础上尽可能地让“更多的事实”说话，那么我们所作出的判断必定和那种“帽子领路”、理念先行的研究势同霄壤的，也必然要全面、客观得多。纵观我国多年的社会科学研究，曾经一度流行的“唯物”与“唯心”、先进与落后、革命与反革命的等以“政治正确”为基准的僵化的学术理路在当今显然是不足取的，也很难适应当今学术研究日益精细化、科学化、学理化的要求了。而新时期以来某些完全脱离历史背景，以一鳞半爪的史料即对某些文学思潮、现象和人物妄下断语的研究也同样是值得警惕的。特别是对一些政治立场与文学个性差异甚大的复杂的文学人物，若挂一漏万地不加以仔细地辨析，就难免会产生失毫谬千之憾，梁实秋恰恰就属于这一类。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梁实秋（1903—1987）的确是一个比较尴尬的角色，他是在新文化运动的熏陶中成长起来的新文学阵营中的一员，却又在其内部以新人文主义的恒常理念对激进的文学思潮反戈一击，作为一种制衡力量横亘于新文学面前，对左翼文学和右翼文学都不甚热心乃至反感，尤其反对“文学工具论”，却也并不认同“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观念。他既坚守文学的“人性”理想，论文谈艺秉承古典精神，同时又积极参与政治活动，从组织“大江会”到参加“国家社会党”，从《新月》时期的论政文字到编辑《独立评论》，他对政治的热情始终不减，指摘时弊不留情面，却又竭力撇清政治与文学的关系；他孜孜于文学事业，教学、批评、创作与翻译齐头并进，分秒必争，既强调

① [英] 卡尔：《历史是什么？》，陈恒译，商务印书馆 2007 年版，第 93 页。

文学的人学本性，却又蔑视大众，以精英化的姿态挑战主流文学的场域规则，在建构的同时扮演着一个解构的角色。审视梁实秋的文学观，我们可以明显发现其洞察与盲视同在，真知与偏见共存。就其人格精神而言，独立思考，认准以后的不知转变是其最大的特色，这种态度使他有意识疏离于趋时的文学大潮，进而在“时势比人强”的背景下，被目为逆流而动的保守主义者乃至反动者也不是完全事出无因。而他却宁可在被边缘的困境中，也绝不改初衷，终生无悔。回望梁实秋，显而易见，他是“俊杰”，但却非“识时务者”。因此，当1949年以后，当老舍自称变为“歌德派”，乐写“遵命文学”后，他始终无法理解，甚至觉得滑稽得有点相声的意味。^①

纵观多年的梁实秋研究，不同的研究者在对其人其文的探寻与建构中，呈现的面目和色彩也是多元的。对此，杨匡汉先生曾经有过一段精到的评论：

江流世变，不同年龄和不同文学观念的人们对梁实秋的记忆，

① 据梁实秋回忆：“胡絮青在《老舍剧作选再版后记》一文中说：老舍生前，由于他的鲜明的政治立场也经常遭到敌视新社会的人的咒骂，这使得老舍很自豪。他曾经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讲台上大声地说过：我本是个无党派的人。可是，我今天有了派。什么派呢？‘歌德派’。他把自己称为歌颂共产党的功德的‘歌德派’，把自己的作品叫做‘遵命文学’……由胡絮青来报导的这一段话，我相信是确实的。为什么老舍会扯下脸来当众自称为‘歌德派’？为什么自称所写的东西为‘遵命文学’？我认为他这话有相声的味道。说相声的有一套不成文的规矩，要不时地咒骂自己，挖苦自己，作践自己，这样可以一方面不得罪人，一方面招大家一笑。其实他说的未必是真心话，还很可能话中有刺，语中带讽。老舍的作品处处都有相声的味道，在国民代表大会讲台上也这么露了一手。胡絮青说他有‘鲜明的政治主张’，倒是我所不解的，我不知道他有什么政治主张，就是有也不鲜明。我只知道他有一个悲天悯人的同情穷人的态度。他基本上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自由主义者如何能够摇身一变而成为‘歌德派’？如何能自称所写的东西是‘遵命文学’？这变化如果是真的，简直不可思议，这事实我无法接受。”（梁实秋：《忆老舍》，杨迅文主编：《梁实秋文集》第3卷，鹭江出版社2002年版，第458—459页）

也许并不相同。上了年纪的人记得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与闻一多、朱湘等组织过“清华文学社”，后来在兵乱中尖锐抨击时政而得罪当局，也在关于文学阶级性论争中被骂作“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稍年轻一些的人记得他应邀上庐山参加过“学界名流谈话会”，也曾被定为资产阶级文学的代表，想去解放区看看却不受欢迎；更年轻的今日之读者，随着他的散文行时走红，又把他视作“出土文物”一般，甚至抬高到“国宝”的地位，等等。一个完整的梁实秋似乎并不存在。人们印象中的这位老先生被不无缺憾的文学史撕成了残片，即便拼合起来，梁实秋大概也只是文坛上“半是魔鬼半是神仙”的是非曲直待辨的人物^①。

的确，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对于一个研究对象而言，考察视角的不同，往往能够释放出巨大的阐释空间，但与此同时，也会不可避免地留下一些偏颇乃至盲区。多年来的“梁研”亦复如此，从20世纪80年代以前单一的“非红即黑”的二元对立的研究模式，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各种研究模式的广泛开展，梁实秋研究走过了一条由点及面扩展、由萧条到繁荣的研究之路。在此一过程中，尽管各种研究成果也越来越多，但是缺憾依然存在，许多学者在“诠释不足”与“诠释过度”中徘徊，在“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中犹疑不决，在文学的情影与政治的魅影中飘忽难定。迄今为止，“梁研”最大的缺憾就在于缺乏对其文学活动的精神主脉和核心价值的深入探讨，缺乏对当时文学生态与主体精神建构间的关系的详细爬梳考察，也缺乏对其文化人格的独特性和普世性的全面把握。这些都尚有继续拓展的研究空间。李怡曾谓：“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必须重视中国现代作家自身主体

^① 杨匡汉：《闲云野鹤，亦未必忘情人世炎凉——重读梁实秋美文》，《天津文学》1994年第2期。